

## 前言

记忆，是个奇怪的东西。有些无关重要的细节记得很清楚，有些重要的事情倒印象模糊。

1983年底，联合国代表团来大学介绍联合国的开发项目，我参加了座谈。翌日，校方负责接待的给我来电话，说派去陪同的一位教授生病了，要我去顶替。机缘巧合，认识了团员之一的中国国家科委外事官员（他后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永久办事处科技参赞，现已离休多年）。北国的深秋，那天特别冷，我又没有车子，两人穿得臃肿像企鹅，在小城的街上溜了半天。湖上来的烈风把脸刮得又红又痛，却一点也没有减低我们的谈兴：中国锐变的动力，西方历程的启示；现代化的演绎，中国传统价值的评价；国家的前途，个人的理想。他说，“先回去看看吧。”我写他一封长信，九个月毫无音信。一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来电话，说湖北省科委想请我去，这样，就开始了我的二十多年的中国讲学、培训、考察、研究和咨询。

1985年首趟回国，感触很大。机会难逢，我妈也想回去看看。那时我已有四个孩子，於是也带了老大和老二一起去。一行四人，从广州到武汉，武汉到北京，却是坐火车。从前书本上的东西现在看到了。山河秀丽，民风淳厚，干部们勤朴为民。日暮过黄河，两岸苍凉，滔滔浊流，看尽了中华民族的兴衰。百多年来受尽辛酸的老百姓是否到了苦尽甘来？内心迴响，久久不息，谁说男儿不流泪。同车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很健谈。我是他的好听众。从他处知晓了许多人民的心声、希望。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国的成就可观，但山河污染破坏，民风奢靡刁狡，官员与商人很多时既分不清也分不开了。若是这位老同志仍未作古，他还会诉些甚麽心声和希望？

回想，85年是个开端。我的加拿大工作与中国工作先分後合，而且很多时是巧合。纵错之间好像有主宰。现从头说起。

1970年香港大学毕业後我在建筑师事务所干了三年，73年来到加拿大又干了一年，跟着就是在美国和英国念书。79年回加拿大，开始在女王大学任教。当教书匠不能只教自己研究、或自己喜欢的东西。政策分析的方法论是我研究和喜欢的东西，但校方坚持要我教“物理规划”，部份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的教授

只搞社会科学，不懂工程、设计，部份是因为我念建筑出身，对城市规划的物理层面较易上手。起初我有点别扭，日後才发觉真是个幸运的机缘。

香港念建筑时读书不足又不透，知识贫血。一到了美国，一接触上比较系统化的社会科学就如获至宝，全都收下来，认为只有社会科学才是城市规划的知识基础，才是真正的学问。但英国几年的反刍又使我对社会科学（是指在城市规划教材中用上的）的意识形态和实用价值发生质疑。再回到了加拿大，因为学校要我教“物理规划”的课程，又迫使我重新再读建筑、工程和设计的教科书。可能是因为人成熟了些，我对这些书又有了新的领会，新的尊重。

教书迫我读书，读书才知在实用学科上单靠书是不足的。85年我决定投入第一线工作，兼职做我学校所在附近的一个小镇政府的规划师。一干是六年，愉快的六年。我做遍了规划的每一瓣：编制和修改总体规划和区划法，设计和评估乡镇发展计划，审批开发商项目，组织公众参与，处理市民投诉，出席听证会作供，联络上级政府，协调同级部门等。这使我深切地体验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启发，和规划工作所需的技能与训练。几年的读和做，驱使了，也装备了我去写《简明土地利用规划》（*Land Use Planning Made Plain* 89年头版，99年第二版）。更重要的，我认识到“为人民服务”需要辨别和接受“人民”是有智有愚，有诚有诈，有正有邪。规划工作者要“择善固执”。择善需要智慧；固执需要操守。

但我并没有放弃自英国开始的政策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和心得写成《主观性的政策评价和规划》（*Towards a Subjective Approach to Policy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Common-Sense Structured*），在88年出版。这是我日後搞政策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论”的基础。

自85-86年开始，我的工作就分三个范围：学校，中国和加拿大。在加拿大的工作主要是为联邦政府做事情，也是机缘巧合。一般来说，在加拿大（美国也是）城市规划是省与市的事情，不归联邦管辖。但一个偶然机会使我置身联邦，对我个人事业和中国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事情是这样的。

1991年升正教授，但又未要承担行政工作，很惬意的。我就想，要为这个寄身所在的国家做点事。於是，看看自己能干的是甚麽，又看看加拿大需要

的是甚麽。那时，在野的联邦自由党搞了一个地方基础设施工作组，研究地方基础设施的维修与建设对经济和就业有何帮助（那时加拿大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高）。我就向他们提意见，出主意，尤其是经济分析和融资战略。93年联邦大选，自由党以投资基础设施去带动经济和创造就业作为主要竞选纲领胜出。他们要兑现60亿加元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就在财务部内成立基础设施办公室。我刚好到了休假年（教书匠是每工作六年可获得一年不用教学，专心做科研），就顺理成章被财务部借用，加入办公室，做政策工作。负责政策的六个人除了我全都是其他联邦部门抽调过来的，我是唯一“外人”。休假年过后返回学校，但仍继续做部长的就业顾问。

财务部不同财政部。它是联邦政府的“管家”，所有联邦部门用钱和用人都要由它批准。在那里工作使我真切认识到西方民主制度中权力的分配、立法与行政的相互制衡、政府的构架和官僚的文化，大大深化了我的政策分析研究。同样重要的是我建立了在联邦的关系网。十多年来参与了不少研究项目，也为不同部门出些主意。

这里有一个巧合可以一提。上面说我在85年开始做一个小镇政府的规划师。工作中很多时要与镇政府的法律顾问拍挡，尤其是出席听证会作供，更要与他配合。他是律师，我是专家。彼此在听证会上一唱一和，才能收效。此君后来从政，由国会议员做到国会议长，并且多次连任。我俩在工作上建立的友谊一直保持，使我日后跟联邦政府的交往得到很大的方便。

联邦工作使我看见部门间争夺多於合作。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的问题更甚。我想改善一下这环境，於是在98年创办一个“国家公共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这不是个普通论坛。它是为三级政府（联邦、省、域市）各部门中主管不动产（土地、楼房、机场、海港、监狱、军营等等）的高级官员提供一个中立场所去让他们坦诚的交换意见和交流信息以减少误会，增加协调和鼓励合作。会员现达二十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全加拿大大部份的公共不动产。去年我才退掉主持工作。通过这个论坛我认识了公共财产管理的政治意味和管理技术的复杂性，也建立广泛的政府人际关系（除了不动产官员外，更包括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其他官员）。这些都大大地帮助了我的中国工作，包括邀请加拿大专家协助培训

和安排中国来的访客到各地考察。

这个论坛的成功鼓励我再往另一个方向发展。我发觉很多大企业或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连锁商场、铁路公司等，它们的正业不是土地开发，但它们拥有大量的地产，而且这些地产都是规模庞大或地当要冲。如何使用，如何保养，如何买卖，如何发展，对所在城市的经济、民生、环境都有绝大的影响。三年前，我创办了“企业地产高级研讨班”，为大企业副总裁级以上的产业主管负责人讲解最佳管理办法，撮合他们与政府官员协商。参加的很踊跃。对我个人来说，也增广了专业知识和关系网络。

90年代，回国多了，也间中会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汇报一下，认识了大使。起初，他想让我个人，或找些加拿大有识之士，去使馆做些专题讲座。话题很广泛，从加拿大的财经、社会到国际大事。听的每次也有二、三十人。2003年初，他荣升亚太地区各国驻加使节团的团长。他是位有远见和风度的政治家。我就建议他扩大这些座谈，组织一个“大使论坛”。从此，亚太地区19个国家驻加拿大的大使们每三月一叙，由我做召集人，安排题目和讲者（非政客、非官员）。我这论坛的目的是加深和扩阔大使们对加拿大和世界的了解，并为他们的交流提供一个中立的场所。他们来自日本、韩国、菲律宾、文莱、印尼、澳大利亚、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中国、蒙古、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约占世界人口的55%。这位中国大使卸任回国后，现时的使节团团长是马来西亚。这份工作使我学到了很多国际的东西，和认识了很多加拿大的智者，并驱使我关注国际动态、关系和展望，和思考人类共存、共进的条件与契机。

90年代之前，我的主力放在学习西方的东西和建立在西方的学术地位，科研项目是西方的课题，写文章、出书都是用英文。我不想做“中国专家”，替洋人研究中国；我想做“外国专家”，一方面帮洋人解决洋问题，一方面替中国研究洋东西。我要先建立在西方的学术地位，打进它们的主流；一方面是为锻炼自己，一方面是为观察人家。91年升正教授后，我就放手做中国的事情，除了99年的《简明土地利用规划》第二版外，写的大部分是中国题目，用的是中文。

中国的事情，加拿大的事情，甚至亚太的事情，都是我乐意干的。但也要感谢校方和同事们给我的空间。我94年担上了的行政工作，现已是第三任了。大学里的大小行政岗位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教授们大都是极有主意的人，管不来。但其实也不用多管。我的宗旨是为同事们提供安定的工作环境，同事们各尽其所能就足够了。可能是这个原因，校方还算满意学院的成绩（其实就是同事们的成绩），同事们也没有给我太多的麻烦。少了後顾，我就可以去闯、去创了。

1985年第一次回国，大部份时间在武汉。到访宜昌，看到坛州坝与宜昌市在区域经济上的脱节，很有感触。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的中间地带。无论是生产因素（特别是劳动力与天然资源）的配搭与发挥，或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都是以区域为本位最合理和有效。从湖北省科委的邀请开始，我联系上了国家科委系统。86年，经国家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了三峡水库辩论，也开展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科技成果商品化，国营企业改革等研究。1994年又参加了国家计委组织的“中部跨世纪大思路——部分省市经济发展战略研讨”。这些比较宏观的政策研究，尤其是经济民生的政策，成了我日後的主要工作方向。

有谓“衣食足则思淫欲”，亦有谓“衣食足则知荣辱”。衣食就是经济民生，是人权的基本，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在麻省念城市规划，有城市经济一科，是我首次接触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开启了我对这门学问的兴趣。到了剑桥念土地经济，学校给我很大的自由度去选课，加上学系间也没有很大的门户之分，因此我接触不少研究经济学的良师益友。从此更投入这门学问。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比较系统和扎实的一门课，很吸引我。但我从开始就把它看作只是一种工具：“经世济民”是手段，“国泰民安”是目的。哪工具有助到达目的就用哪工具。因此，我从没觉得有需要去选择接受抑或抗拒潜在於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为主导）底下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的意识形态。既然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压力我就可以非常客观地去思考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和逻辑，去监辨和分析这些理论对中国国情的吻合和矛盾，真正的“洋为中用”。

我不是学府派的经济学家，我关心的是民生：人民的生活和生产。这些都是活生生、实实在在的事情，不是抽象的数据和理论。我从开始就留意老百姓的作息和喜恶。我发现最敏锐的观察者往往不是学者、专家，而是出租车司机、

饭店服务员、里弄的老太太。直到前几年，每次到中国总会在睡前花点时间看看不同电视台的广告，卖的是甚麽东西，用的是怎样的招睐，一一录在记事簿里，作为我研究民生的素材。

城市规划是本行。第一次回来就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接上。自 86 年开始就断断续续的做了很多交流和培训，包括城乡规划、房地产开发、市容设计、土地管理等等。多年交往，认识了许多规划界的朋友。通过他们我了解到中国城市化的种种问题和契机。这使我对一知半解的“洋为中用”更有戒心。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完全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上。这制度是土地增值分配的构架；这构架（包括这构架缔造的种种利益的组合和矛盾）完全支配了西方城市发展的方向、规模、形式和速度。无论我们对西方城市化的好与坏有何想法，在西方泥土上产生的规划理论和实践怎能移植到“土地共有”的中国去？“洋为中用”的“用”只可以是启发性的，包括负面教训。我认为，用不用洋货是要张开眼来做决定的。我选择到西方学习和生活是为了想了解洋货在洋泥土上是怎样生长出来的，也就是洋货的真面目。这样，我们才可以智慧地“洋为中用”。但在进口洋货的大潮流中，我总觉有点在孤军独战。

1995 年，偶然机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请我去座谈。翌年，我邀他们的局长访加考察。就这样与他们建立起多年来的培训与交流。国土局、地矿部和一些相关部门於 1998 年合并为国土资源部。当时，我要选择结束与国土局的合作还是增添资源管理的工作。我决定邀请学校的地矿工程系和地质经济系入伙。自此，与国土资源部的培训、交流和研究成了我的主要中国项目。经我校的长、短期培训的中央、省、市干部超过 600 人。2002 年，经他们提名，获得国务院颁给国家友谊奖，这使我的工作走上了另一个台阶。

国家友谊奖对我有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是很大的鞭策。提名是人家的主意，但得奖只可以说是幸运。在中国工作（来自各行各业和各种形式的工作）的外籍专家约 50 万人（现可能不止）。每年经各部、委、省、市、企业提名，国务院评审，选出 50 名得奖人。2002 年破例选 51 人，因为同分。我估计自己是第 51 名。为甚麽？得奖者由国家外专局招待，在国庆前到北京（妻也沾了光）参加各项庆典和国庆国宴。几天来跟这些外国友人（外籍华人只三几个）在一块儿，知道了他们的“功绩”，自己能不汗颜？例子实在太多。只说一位来自美

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的退休院长。他是研究妇科的,发明了一套可放入人体的微形手术仪器,自然名成利就。他却跑到中国来,十多年来在百多间医院建立使用这套仪器的手术室,又向制造商募捐仪器转赠给医院,并训练医生使用。可是,这亦不是他最大的贡献。他多年来向出版商人讨来印刷过多的医学教科书去转赠给中国的医院和医学院,共300万册。这些都是“新书”,中国海关要打税。他就逐册盖上他个人的印章,变成“旧书”。我一算:左面一堆“新书”,逐册拿来,打开,盖章,关上,放在右面的“旧书”堆,起码要10秒钟。300万册就要8333小时。就是一个专人去做,每天做12小时,也要两年才做完。这老头的“贡献”真算可以了罢!听说曾有一位日本农业专家,终生为中国改良苹果品种,死後火化还要把骨灰埋葬在中国农场的一角。这些都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比许多以改洋名,喝洋水为荣的中国人真诚和深厚多了。我最敬佩他们的超越。只有超越个人才可以真心关怀世界。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物质水平确实提升了,但社会却变得更现实和功利,公益和大我的理念越来越薄弱。看见这些“洋劳模”,有“礼失求诸野”的感叹。

近几年认识了些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其他智库的朋友。在谈论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甚麽?”这问题有很大的兴趣,也好像有点灵感。在2004年就一口气写了三篇,名之为“经济三部曲”。虽是班门弄斧,但可能因为没有学派包袱,又不太懂专业术语,反而在思路少了拘束。搞经济学的朋友们读了倒觉得有点新意。就这样子我不自觉地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学习的领域。清华的公共管理学院给我一个交流的渠道,每年总去一两趟。也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了一个项目,每年四名研究员来加拿大和我共同做政策分析和比较研究,都是爽意的工作。

我在《城市规划》写文章也是86年开始的。(第一篇是“我对中国引进城市规划教育模式的一些意见”(1986(1))。从此,平均每年总有一篇。到98年,开始写“美加飞鸿”(後改“海外快递”),也就每年三、四篇了。

写“美加飞鸿”(“海外快递”)是我中国工作是一大转折点。之前,我的接触面局限於直接的讲学、咨询和培训。之後,是“以文会友”。不敢高攀“文以载道”,但我认为文必有其“道”,只是正、邪之分而已。任何文章都有其立场。有些明显,有些隐晦,甚至有些反讽。通过文章,我可以比较系统性的谈道说

性，人家也可以比较客观的评审我的道理。八年多的写，对我有绝大帮助。很多东西，脑子里觉得蛮有道理，不一定讲得明白，更遑论写得清楚。写说理的文章就好像自己跟自己辩论。

写文章本是随缘，想到甚麽题目就写甚麽。现今回顾一下，发现在不觉中倒可归纳以下三类：经济、土地与城市。有些是理论，有些是观察、但总带点方法上和哲理上的探讨。有些在《城市规划》发表过，有些在别的刊物，也有些未有公开。现选上部份比较代表性的放进这里。有些是多年前的东西，有些是最近所作，反映了国情的改变和我个人的体会与分析。

我是个“方法论者”。学海无涯，我为自己的航程选择带上指南针。我希望无论走那个方向，去那处地方，都可以用作导航。“人家的月亮”和“外国的泥土”两篇是我在方法和思路上的总结。我把它们放在前面，好使读者知道我自己来自哪里，走向哪里。

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看，规划（包括政策规划）有几个步骤：监认问题，制定目标，设计方案，选择方案，实践方案，和监测反馈。每一个步骤都应该有一套合情、合理和合法的方法去指导如何去做好观察和分析，如何验证因果的正误，和如何处理权利的关系。“方法论者”研究千万案例中的观察角度与范围、分析焦点与层次、因果逻辑与结构、权力布局与制衡和利益分配与协调，从中找寻异与同、分与合，籍此发掘一些恒数与常规，去用来建立一套完整的、放之四海而准的指导法则。我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题目虽是林林总总，但都是以政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统一起来的。这里我选了“政策分析”，“比较研究”，“经济与几何”与“和谐与适度”四篇。

经济民生是我最关注的。上面说到的经济三部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甚麽”，“可持续性消费经济”和“经世济民”是比较近期的想法，都放在了文集里。我第一篇有关经济的文章是90年代初为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写的“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考虑”，主要是指出内需市场的重要性。这论点现今渐成主流。区域经济与农村经济也是我的研究方向。这里选了“流域发展模式的选择”，“西部地区开发的战略”，“农村发展与市场经济”和“解三农之困”几篇。

土地与经济是分不开的。我按写作先后顺序选了“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与国土开发：几个政策上的意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城



市土地开发上的意义”两篇。这几年我特别关心土地管理，尤其是城市边缘土地增值分配不公与不均已动摇到农村的稳定。这里选了三篇比较战略性的文章：“在耕地转建设用地中保护耕地、保护农民利益及提高土地市场经济效率”，“集体所有土地股份化”和“指标拍卖（竞投）的一些想法”。

有关城市的文章，比较严肃的我选了“精明增长”，“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规划战略：来自生态学对城市规划的启发”和“理想城市与城市理想”；比较轻松的选了“内与外、大与小、凹与凸”和“高与低、快与慢、新与旧”两篇。

这里也收了几篇书评。这是需要向读者们解释并请他们体谅的。中国搞现代城市规划，本身理论薄弱。因此，特别容易被西方系统化的“先进”理论慑服，尤其是它们的程序理论和道德理论。我初出国就有此经验——从被慑服到心悦诚服。但我的治学心态是“以水为法”。水本身是没有形状的，它的具体形状就是容器的形状。处身在西方社会中，我决定跳出书本，要直接体验这容器的凹凸、方圆、糙滑，去找寻直觉的认识，并利用这认识去印证它们的理论。经过这样的观察和反思，我发觉很多西方的规划理论绝对是它们独特社会的畸形产品。这些货色对西方社会适合与否我不管，但对中国国情就是完全脱节的。盲目的引进会带来灾难。我把一些比较歪曲和不老实的形容做“色情文学”——令人亢奋，不使人满足，事后更有空虚的感觉。浪废宝贵的时向和精力去追求虚幻，把正事也掉了。国内不少人虽有同感，但这些西方“理论”既被列为经典，怎能抗拒？我虽是人微言轻，既然看出这些都是“皇帝的新衣”，怎能缄默？於是，2000年一口气写了三篇有关理论经典之作的书评，分六期刊出，题目叫“可读 必不用之书”。事关重大，我花了不少时间去逐章分析这些“经典”，追寻书中提到的参考材料，系统化地搜集所有有关书评，去暴露这些经典理论的弱点。我也利用这几篇文章去谈规划工作的道德观和规划工作者的操守。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系统和深入地看过这几本书。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发现是这麼多的书评家对这些“经典”的评价是如此负面，最大的谜是它们怎麽样会变成“经典”。这可能说明了非但中国的规划理论薄弱，“先进”的西方也如是。这三篇都叫“可读 必不用之书”。第一篇为“顺谈操守”，第二篇为“顺谈情况含糊和感情矛盾”，第三篇为“顺谈‘法’与‘字’”。发展中国规划理论

急不容缓，那也是我倡办“求是理论论坛”的推动力。

读书是件赏心乐事。读後反思，偶有所得，其乐无穷。年青时读书不足，部份是自己懒惰，部份是没有读书风气。读书是吸收前人的智慧。不站在智者的肩上，怎能攀上更高的台阶？我提倡“求是理论论坛”是因为我坚信中国的城市规划应该，并可以，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基础。这基础可以建立在三条支柱上：中国传统哲学的启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西方实证主义的借镜。要建立这理论基础单靠读书不成，但非靠读书不可。在《美加飞鸿》写的第一篇是“城市设计与真善美的追求”，是我读西方经典多年累积的心得。读古籍去寻启示也是乐事。这里选上“哀公问政”（谈的是变与稳的选择，人与制度的比重）和“孟子见梁惠王”（谈的是仁政、民生和生态的关系）两篇。我很想多读些古书，特别是管仲。

“寄小学友书：中外、古今、成败”是给想到国外念书的朋友写的。谈的是“洋为中用”的求学方法。是交待，也是共勉。

梁鹤年

2007年7月

于加拿大京士顿